

未在本書的主體部份對官寺的內部結構進行討論。選取一些資料較為豐富的個案來探討官寺的內部結構，可能是目前較為可行的一種辦法。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邊疆地區項目「五代北宋時期禪宗傳法的空間擴展」(19XJC7300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魏晉隋唐交通與文學圖考」(18ZDA247) 研究成果]

葛洲子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邱永志，《「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01頁。

明代白銀問題是學界的研究重點，涉及到一條鞭法、國家與社會的轉型以及中外貿易與交流等重要問題。目前學界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是白銀貨幣化，把明代看成歷史特例，認為明代經歷白銀從非貨幣商品變為合法貨幣的過程，而明後期大量海外白銀流入是白銀成為主幣的動因；二是白銀進步論，認為白銀是貴金屬貨幣，具有先進性，其成為主幣反映明代市場經濟的繁榮。

該書從宏觀上探討在明代不同時空，白銀如何從眾多貨幣中崛起為主幣的漫長曲折過程，以回應以上觀點。首先，作者贊同明代貨幣白銀化（即白銀成為主導貨幣）的提法，認為經過宋金元的演變，白銀已經貨幣化，並非在明代才開始成為貨幣，但明初洪武貨幣秩序暫時打斷了白銀的貨幣化進程，所以才會有「非法到合法」的演進。在此秩序的反向推動作用下，白銀逐漸成為主幣。白銀崛起的主因在於中國內部的歷史演變，而非海外白銀的流入。其次，面對被部份學者神話化的貴金屬材質，作者認為白銀在明初僅是眾多實物貨幣的一種，在整個明代白銀都是以稱量而非鑄幣形態被使用，且貨幣白銀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不是市場繁榮的自然結果。貴金屬貨幣不等於先進貨幣，更不等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分析貨幣不能迷信材質進步論，亦不能理論先行。

第二到第六章是正文，作者將其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第二、三章）追溯白銀貨幣職能的發展歷史，以及明代貨幣白銀化的根本體制促因。作者通過回溯宋金元時期的歷史，論證在明代以前，白銀已經具備較完整的貨幣職能，並發揮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明代發生

的，實際上是貨幣白銀化過程。之所以白銀沒有直接成為明代的主導貨幣，與明初制定的貨幣政策有關，即作者歸納的「洪武貨幣秩序」。這套秩序違背市場規律，為實物勞役型財政服務，本身存在巨大的體制缺失，具體表現為實行單一寶鈔制度、禁銅錢、禁金銀、官定折價等。作者認為這是白銀最後能夠替代政府主導的鈔和錢的根本促因，白銀的逐漸崛起正是這套秩序被衝擊和瓦解的過程。

第二部份（第四、五章）探討白銀在禁令下的擴展流通。明初的禁令並未能阻止白銀的使用，但分流成政府和民間兩條相互獨立的流通軌道，即「雙軌流通」。在政府方面，由於政府可以通過折銀財政獲得巨額收入，加之作為官俸的寶鈔不斷貶值，而正德、景泰之際的戰爭，摧垮政府維持寶鈔的努力，所以政府對於白銀的需求越來越多，貢賦體制吸納大量白銀。在民間方面，市場上主要通用貨幣前後經歷從紙鈔到銅錢到白銀的發展過程。由於「洪武貨幣秩序」的體制缺失，寶鈔不斷貶值，被市場棄用。政府和民間都開始改用銅錢，但隨之而來的便是銅錢供應不足，民間私鑄成風，市場流通的銅錢品質越來越差，而政府始終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多次鑄錢救錢活動均告失敗。於是，源自民間的穩定通貨白銀，開始在市場上逐漸排擠和替代官方主導的銅錢，形成「銀進錢退」的現象。作者也提到，白銀並未完全取代銅錢，因為在基層小額交易中，高價值的白銀不如低值的銅錢便利，白銀與銅錢在不同層面「各司其職」又相互聯通。

第三部份（第六章）論述白銀的兩條流通軌道在明後期合流，白銀主導地位得以確立的過程。首先，明後期國內市場的發展與海外白銀的流入，都促進國家與社會對白銀的需求，而白銀的兩條發展軌道合流，在一條鞭法實施後，貨幣白銀化逐漸完成。其次，作者從貨幣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貨幣白銀化確立過程在當時士人思想中的反映，提出明後期的「反銀論」思潮並非落後保守，恰恰是士人對國家貨幣主權下移產生危機意識的表現，證明白銀確實已經成為主導貨幣。最後士人提出「銀母錢子相權」論，是對貨幣白銀化事實的進一步認可。

該書主線清晰，重點突出，論證詳實。第一，以貨幣關係特別是銀錢關係為主線和重點。作者區分國家的信用貨幣「鈔」、鑄幣「錢」與民間貨幣「白銀」，以便讀者理解明代貨幣的來源，並詳細探討鈔、錢、銀三種貨幣的關係。作者認為寶鈔不具貨幣價值，只靠法令強制使用，而明政府的紙幣政策長期失效，所以寶鈔貶值嚴重，加上政府救鈔失敗，民間和政府便開始突破錢禁。相似的進程也發生在銅錢上，由於政府無法提供及維持優質錢，

導致市場上劣質錢充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迫使民間只能選擇價值穩定的白銀，以「新的良幣驅逐舊的劣幣」。明代錢法「失敗」主要與國家政策有關，而非銅錢本身價值出了問題，這一認識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明清已進入「白銀時代」，清代仍推行銀錢複本位制。作者沒有回避銀錢關係這一貨幣史難題，詳實地分析明代主要貨幣的變化過程，展現了深厚的史學素養。

第二，相較於已有研究，作者沒有就經濟談經濟，也沒有將貨幣白銀化的原因簡單歸於某種因素，或籠統地說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更沒有盲目發散到各個領域，而是強調不同時段的不同促因。首先，在明初，作者極為重視政治的作用，把「洪武貨幣秩序」看作白銀崛起的根本性體制促因。明中葉時，貢賦體制用銀和市場有效貨幣缺失是主因。在明後期，作者肯定了市場發展和海外白銀流入所起的促進作用。其次，作者認為需要從國家和民間分立的角度去審視白銀流通的擴展，因為在不同軌道上，擴展的原因、方式和程度都不同。最終兩條軌道合流，貨幣白銀化才算完成。

第三，緊扣時空關係來論述白銀問題。從時間上看，作者上溯到宋金元時期，分析白銀貨幣職能的形成過程。然後，作者論述白銀從明初的實物貨幣，如何逐漸崛起為主導貨幣。最後，作者將「白銀時代」格局形成的時段確定為嘉萬時期。此時，國家貢賦體制對白銀深度依賴，一條鞭法的實行確立白銀的支配地位（頁41），而且政府的多次鑄錢活動失敗，貨幣白銀化在士人的思想中也有反映。在空間上，僅從個別區域很難窺見白銀發展的全貌，作者以多個地區為實例，分析貨幣版圖中行錢之地（即流通銅錢的地區）與不行錢之地貨幣流通的變化，論證白銀在民間逐漸排擠銅錢及其他實物貨幣，使得行錢之地不斷萎縮，從而在民間市場逐漸崛起。同時，作者也提到在許多實物貨幣長期佔主導的地區，白銀沒有成為主幣，如雲南以貝幣為主幣，貴州則雜用鹽巴、低成色銀等貨幣。

第四，使用考古出土文物和貨幣思想史作為論證材料。一方面，作者結合出土文物所反映的銅錢「洪武窖藏」現象，說明明初禁錢令得到有效執行，洪武貨幣秩序確實發揮着作用。另一方面，作者認為「貨幣思想史中的論述既能成為重要史料，也反映貨幣演進的現實」（頁14），將貨幣思想史納入分析中，有機結合貨幣思想史與貨幣經濟史。

該書亦有不足。首先，在討論寶鈔的衰落時，作者未能詳述寶鈔嚴重貶值後卻沒有立刻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這背後有一個利益群體，即內府宦官存在。寶鈔貯藏於內府庫，宦官通過發行、徵收和兌換獲利，所以他們不僅

不允許寶鈔消失，而且在寶鈔折銀徵收和實物入庫貯藏中上下其手，獲取暴利。此時的寶鈔已非嚴格意義上的貨幣，而是被權力關係維持的斂財工具。其次，文中對「不同時段白銀在民間基層的具體使用」，以及「在不行錢之地中白銀的擴展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可能由於材料缺乏，留下可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期待將來隨着民間文獻的大量發現和整理，能深化這些探討。

楊賢毅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王健，《多元視野下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的互動：以明清江南為中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200頁。

繼《利害相關：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下簡稱《利害相關》）一書出版九年之後，王健再出新著《多元視野下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的互動：以明清江南為中心》（以下簡稱《多元視野》）。該書作為江南民間信仰研究的最新著作，值得關注。

本書除緒論與結語，共分四章，分別圍繞明代毀淫祠的多元面相、神靈入祀與地方社會、江南日常信仰空間的呈現、非常態下的江南地方信仰與民眾心態四個問題展開論述。在《利害相關》一書中，作者所探討的主題較多，包括對民間信仰的整體描述與分析（涉及民間神靈的分類、祠廟收入和產權、民間信仰的組織體系和參與群體，以及民間信仰與地方經濟、社會空間的關係），廟界問題，士紳、家族關於民間信仰的理念與實踐關係，國家政權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及基於地域社會視角對特定神靈（楊老爺）信仰的歷時性考察。其中，關於江南地區除祀典和淫祀之外存在私祀現象與概念、市鎮廟宇與鄉村廟宇的關係並非如濱島敦俊所描述的那樣簡單等論點，以及關於松江府周邊地區楊老爺信仰、周孝子信仰的個案研究等，都具有啟發性，令人印象深刻，此處不擬深論。在《多元視野》一書中，作者則聚焦於《利害相關》有所討論但未及深入的國家政權與民間信仰的互動問題，並從毀淫祠、神靈入祀、信仰空間、王朝鼎革對地方信仰和民眾心態的影響四個方面加以討論。

第一章題為「毀欲何為：明代毀淫祠的多元面相」，主要探討毀淫祠問題。作者在本章中以常熟知縣楊子器為例，敘述其在當地的毀淫祠行動，指